

第三帝国 内幕

[德]阿尔贝特·施佩尔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德〕阿尔伯特·施佩尔著

邓蜀生等译 胡其鼎校

第三帝国 内幕

阿尔伯特·施佩尔回忆录

封面设计：宁成春

Albert Speer
ERINNERUNGEN

Verlag Ullstein GmbH
Frankfurt/M.-Berlin-Wien
1969, 1975

INSIDE THE THIRD REICH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Richard and Clara Winst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70

根据英国韦登菲尔德-尼科尔森公司1970年出版的英译本转译，
参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乌尔施泰因出版社1975年德文版校订

第三帝国内幕

——阿尔伯特·施佩尔回忆录

〔德〕阿尔伯特·施佩尔著

邓蜀生等译

胡其鼎校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0.5印张 482,000字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3,000

书号11002·594 定价2.05元

中 译 本 序

作为有关纳粹德国的重要史料之一,《阿尔伯特·施佩尔回忆录》是值得翻译介绍的。

阿·施佩尔(1905—1981年)原是一个年轻、无名的建筑师,因受希特勒赏识而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先任德国建筑总监,后任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一度在纳粹政权中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并曾有可能被希特勒考虑为自己的接班人。他又是希特勒私交圈子中的一员,如他本人所说:“如果希特勒有过朋友的话,那末,我必定是他最密切的朋友中的一个。”由于他的这种地位和身分,使他能够提供旁人所不能提供的材料。施佩尔在战后的纽伦堡法庭上认罪服罪的态度是比较好的。他在施潘道监狱中偷偷写成的这部回忆录,既是为了留给他的儿女作为鉴戒,又是为了使自已搞清问题,所以能够将事实和盘托出,坦白地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作所为。一般认为,这部回忆录是一份比较老实的自我交代,所提供的材料基本上是可信的。

这部回忆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关于法西斯元凶希特勒的一本不完全的传记,或者说,是1933年至1945年希特勒的侧面观。施佩尔是纳粹党的“后来者”,他能跻身于最高当权者之列,全靠希特勒的提携,他因此对希特勒感恩戴德。当败局已定,希特勒下达“焦土命令”时,他曾起念除掉希特勒,但那也只是由于希特勒的这个命令严重损害德国实业界、即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当他打

消此念后，还冒生命危险，飞抵被围困的柏林，去同希特勒作最后告别。只是到末日临头，成了阶下囚时，他才开始认真检讨过去，想搞清楚自己怎么会象浮士德博士同魔鬼梅靡斯特订约似的把灵魂出卖给这个历史罪人的。他让往事重现，使自己看到这个曾经使他神魂颠倒的希特勒身上的专横与愚昧。原来这个不可一世、妄图独霸世界的独裁者竟然如此迷信“天意”；这个天天在欺骗和愚弄千百万人的政治骗子，却无时无刻不在欺骗和愚弄着自己，并在政治野心的驱使下，在自欺欺人中走向覆灭。施佩尔在“前言”中说，“在描写如何朝我以及其他迎面而来的希特勒时，有不少同情的笔调会是明显可见的。也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希特勒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具有才干并为事业献身的人。但是，我越往下写，越感到这些只不过是表面的性格特征罢了。”但是，他始终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矛盾，这表明他不能摆脱个人的恩怨，而且只从个人的性格上去寻找这个政权覆亡的原因（比如他还认为如果戈林不吸毒、不腐败，本来是可以挽救这个政权的），这使他不能从根本上认识纳粹主义及其政权的反动本质，看不到这个政权从产生之日起就注定要灭亡的必然性；这也使这部回忆录在细节的真实之上笼罩着历史唯心主义的迷雾。

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所著《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是以档案材料为依据，内容侧重于外交与军事方面。这部回忆录则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主线，侧重于柏林总理府、上萨尔茨山希特勒的山庄、元首大本营里纳粹政权内部的谋划决策、争权夺利、尔虞我诈、阴谋倾轧、腐化堕落。这两部书不但没有重复，而且可以互为印证。

《阿尔伯特·施佩尔回忆录》于1969年在西德初版后，即引起国外史学界的重视。1970年英译本问世，易名为《第三帝国内幕》。此书由萧乾同志推荐翻译，参加翻译的有邓蜀生、于干、张伯健、

方生、韩光焘、朱基俊、陈羽纶及校者本人。校订时参照了德文原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乌尔施泰因出版社 1975 年版)。

胡 其 鼎

1980 年 12 月

英译本序

纳粹时期的一些没有弄清楚的问题，现在仍然存在着。纳粹党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和遭受的惨败，一直是人们不断研讨和分析的课题。文明世界的主要中心之一，怎样会变成千百万人民受折磨的场所？怎样会变成由一些罪犯们如此有力地统治着的一个国家，以致在总共牺牲了大约三千万生命才把它打垮之前，它竟然能够征服大部分欧洲、向其他各洲进军、把它的纳粹党旗从挪威一直插到高加索山脉和非洲？在这个曾经有过许多驰名十九世纪的“优秀”德国人：思想家和诗人的国度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象阿尔伯特·施佩尔这样一些聪明、善良、有教养、有原则的人，怎样会对这场纳粹运动如此着迷，怎样会被希特勒的魅力弄得如此神魂颠倒，竟然能够接受秘密警察、集中营、胡说八道的雅利安英雄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以及元首的战争屠杀等等名堂，并且尽心竭力地支持这一政权呢？这些都是难解之谜。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很可能是这一统治集团中最有才华的一个成员。在这本回忆录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些难解之谜的某些答案，也可以看到关于这个纳粹国家的很可能是最为完全的内幕。

1931年施佩尔参加纳粹党的时候，他从来不大关心政治。他出身于大资产阶级的家庭，系曼海姆市的名门望族之一。他的父亲是建筑师，生意兴隆，因而家庭生活非常优裕，经常参加市上流社会的文化和社交活动。施佩尔的父亲阅读自由主义的《法兰克福日报》，一个保守的建筑师，家里订阅这份报纸，颇不寻常；但

是他完全反对纳粹党人，因为他认为他们与其说是国家主义的，倒不如说是社会主义的。在1923年通货膨胀时期，这个家庭在经济上受到损失，但是生活一直很好，过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很少有人能享受到的资产阶级的舒适生活。

当时的德国，有成百万人失去工作和丧失社会地位，被人遗弃，狼狈不堪，但阿尔伯特·施佩尔非属此列；他之所以参加纳粹党，是因为他在1931年听了希特勒的一次讲演，使他对政治的微弱兴趣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在1931年，大多数象施佩尔那样成长起来的青年人，都不大注意希特勒和他的街头战士；希特勒的势力是随着失业人数的多少而升降的。施佩尔听希特勒讲演的地方是柏林，1932年11月在该市举行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左翼人士投票赞成希特勒的只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即使在国会纵火案以后，当德国其他各地投票赞成希特勒的几占百分之四十四的时候，纳粹党人也只得到柏林总票数的三十一一点三。因此，施佩尔自己作出了自己的决定。和许多人一样，他也在寻找一种强有力的新学说来清理自己的思想。他曾涉猎过多种哲学思想；他读过施彭格勒^①的著作并被弄得灰心丧气；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知识分子那里听说过关于世界末日的哲学，并认为这类哲学是由于各城市中混乱不堪和毫无希望的情况而产生的。现在，他抛弃了过去人们教育他去相信的大部分东西，因为这些完全不适用于他周围的混乱情况。

施佩尔听到的那次讲演，对象是大学和专科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员。象所有老练的政客一样，希特勒对听众大唱高调。他穿的

^① 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 一译斯宾格勒)，德国哲学家兼历史学家，著有《西方的衰亡》一书，代表当时民族主义、反民主、反共和的思潮。——译者

不是他的街头战士的褐衫，而是一套朴素的蓝色服装。他用一种相当低沉的声调诚挚地谈论一个恢复了元气的德国。在施佩尔看来，希特勒的信心似乎是对于施彭格勒的悲观论调的一副解毒剂，同时也是实现他关于一位古罗马统帅兼皇帝即将到来的预言的保证。这些话可真是佳音哪：看来，共产主义的威胁以及魏玛共和国历届政府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的状态完全可以解决了。在民主办法似乎都不能奏效的时期里，对于很多在1931年认为必须采用大胆的新办法来对付德国的深刻困难问题的青年人来说，希特勒的讲话有很大的号召力。历届拼凑起来的联合政府，寿命既短，治国也无方，根本不能找到解决德国经济衰退、社会不安和军事软弱无力问题的良策；这种政府必须由拿得出新解决办法的个人和政党取而代之，必须由一位懂得实力、法律和秩序的意义的领袖取而代之。纳粹党人的反犹太主义是可以原谅或忽视的，可以把它看作只是一时的“孩子病”，如果人们喜欢他们的其他纲领的话。正如马基雅维利^①所说的，政治方面的错误判断和错误行为，很象肺结核病，初期很难看出但容易治愈，后期则容易确诊但很难治愈了。

但是，对施佩尔有吸引力的并不是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纳粹党。吸引他的乃是这位元首的个性，和大规模恢复工作的蓝图，后者给他提供了设计建筑物的绝妙机会。正是由于希特勒和纳粹党，施佩尔得以实现他青年时代在建筑方面的抱负，并且又有了他以前从未想象过的新的抱负。正如他所说的，尽管在“砸玻璃之夜”被砸的犹太人商店中的破盘碎碗就摆在他的面前，他也力图对纳粹党式政府所犯下的任何暴行都视而不见。他在自己的专业范围里，以及日后在政府任要职时所能完成的业绩，使他如此眼花缭

^① 尼古洛·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意大利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哲学家。——译者

乱,致使他可以闭上眼睛,对于可能打乱他的目的的事情几乎一概不看,不论这些事情是多么讨厌可恶。他所要作的只是设计、建筑并为一种新秩序服务。在这方面,手段是很多很多的,只要他不多加考虑采取这些手段所要付出的代价。

施佩尔有很充足的时间来问他自己关于他在第三帝国所起的作用的问题。在纽伦堡,他因违反人道罪和战争罪行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他服满了这二十年的刑期。在这二十年中,他花了许多年来写这本回忆录。回忆录是写给他的儿女看的,或许更正确地说是写给他自己看的。回忆录必得偷偷摸摸地写,往往写在一些碎纸上,或者写在从监狱漆匠的卷筒纸上撕下的纸片上,他靠在铺位上假装阅读,用书来遮掩书写。回忆录是由监狱里一位职员给偷运出施潘道监狱^①的,这位职员是个德国人,他本人也曾当过强制劳工。

读者将会发现,施佩尔并不打算为自己开脱罪责。在战败后,当他最后反躬自省、痛苦地认识到他出力使之生存下去的是什么样的人 and 什么性质的国家时,他对他自己和对他的同伙们都是毫不留情的。他对纽伦堡法庭说(尽管他知道说这种话可能使他有丧命的危险),作为希特勒政府的一个成员,他对于所犯下的罪行,对于他所管辖的工厂中的强制劳动,对于党卫军为他的生产线提供集中营俘虏时他和党卫军的勾结行为,对于他在一个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的政权里所起的明显作用(尽管这六百万人不是由他直接参与杀害的),都负有完全责任。纽伦堡起诉书控告他有四条罪状:阴谋策划进行侵略战争,参加这场战争,犯有战争罪行和违反人道罪行。他完全承认这些指控所依据的理由——这种谴责主

^① 施潘道(Spandau)为柏林一区,该地的监狱为监禁纳粹德国战犯的地方,由苏、美、英、法四国共管。——译者

要是他自己良心的一种反映——即他在一个罪行累累的政府中担任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时，干得实在太卖力气了。

法庭认为头两条没有他的罪。至于其他罪行，除俄国人主张判处死刑外，大多数人注意到他有可使罪行减轻的情况，理由是施佩尔曾设法为他的工人提供适当的食物和住所，尽可能使工人还过得下去的生活，做还做得了的工作。法庭还注意到，他曾公开反对过希特勒（而且当他知道这个元首只是为了为自己赢得一点点时间就准备摧毁德国时，他确曾计划杀死他）；而且，施佩尔反对过希特勒把他自己的命运和德国的命运等同起来的错误想法，这种胆量很不寻常，因为这个元首曾经处死过许多人，只为他们流露了一点失败情绪。

法庭，特别是法庭里的俄国人，根据经验以及摆在他们面前的证据，知道施佩尔曾经为这个帝国作了多少事情。他曾远远超过戈林，成为这个帝国的第二号人物。在战争接近结束的时候，一份英国报纸甚至写道，对于德国作战实力来说，他比希特勒本人更为重要。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期，希特勒的神秘性已逐渐消失，他所作的决定也越来越离奇古怪；正是施佩尔，他在1945年以前一直使战争机器开足马力，生产得越来越多。只是在许多城市已成废墟，希特勒命令炸掉最后一些工厂的时候，施佩尔才开始怀疑他的许多同僚如格德勒、维茨勒本、鲁道夫·佩歇尔等人早已明白的事情：如果希特勒胜利了，那对于德国来说要比任何败仗都会有更糟的恶果。

在监狱里，施佩尔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要找出为什么他费去这样长的时间才明白他选择了错误道路的原因。他进行了长期的仔细的自我分析，对于促进这种自我分析过程来说，监狱是十分适宜的场所。他差不多能够阅读他所愿意阅读的任何非政治性书籍。于是他求教于心理学、哲学和形而上学。他说，在他过公民生活

时，他根本没有阅读过这类书籍，也根本没有想到他会有时间来阅读这类书籍。现在，当他检讨一生中的全盛岁月时，他可以扪心自问，对自己提出一个人在遭受严重危机时或在遭受危机以后经常提出的问题，而要在当代世界中追逐功名，自有许多急务要做，这些问题便很少能够得到彻底的研讨了。施佩尔并不为这样一种狱中生活的要求所妨碍；使他苦恼的问题肯定是有的一——他的家庭的幸福，国家的糟糕情况，而他曾为这个国家进行战争从而也为它的毁灭出过力——，但是他的当务之急乃是向自己说明自己。他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全都写下来。在他所说的话中，他没有漏掉任何东西。他已被定罪，并被判处徒刑；他已承认他的罪行；现在他的工作是去弄清楚他都作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要作这些事。因此，这本回忆录的读者是很幸运的，因为作者将尽可能向读者讲清楚，这个施佩尔究竟为什么作了他所作的事情。所以，这份纳粹德国编年史稿，同时又是为这个国家效力的最有才干者中的一员的自我交待材料。

内省对于一个技术专家来说是特别不寻常的事情。象施佩尔这样一个设计蓝图、安排庞大的工程规划的人，多半是竭尽全力去操纵指挥别人，改造外部世界，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完成生产目标。他的工作不是内省的；但是在施潘道监狱里，施佩尔决不能依靠别人来完成他的计划，而只能日日夜夜地由他自己来作。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他能够甘心情愿地作这件事，因为他确信法庭对于他的案件的处理是公正的。他和检察官同样有兴趣要弄清过去发生的事情。

他一直保持着这种客观性。关于本书在英国出版的问题，人们对他提出过一些建议，其中之一是，他应该去会见英国广播公司的前英国首席检察官肖克罗斯勋爵（在审判时期是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讨论讨论纽伦堡案件。施佩尔说，他很愿意会见英国、

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检察官；他并不怨恨那些让他在监狱里呆了二十年的人；他也不反对去会见对于他在其中起了如此显著作用的这段历史真正有兴趣的任何人。

他回到他已经离别了二十一年的海德尔堡之后，作了一些简单的普通事情，这些都是一个必得重新从头作起的人需要作的事情。他回到内卡河附近的避暑别墅，这是他度过他的童年的地方。由于他在少年时代曾经有一只圣伯纳德狗，他又买了一只，借以克服长期背井离乡的苦闷，恢复他的早期生活。他打算重操建筑师的旧业，尽管这一回的规模和过去相比将是极其微小的。人们对待过去的灾难有各种十分不同的态度。例如，德尼茨海军元帅就不愿意谈论施潘道监狱的事情。他说他已把它扔进箱子里，不愿意谈论它了。可是施佩尔却毫无困难地谈论他的监狱生活——不仅毫无困难，而且是平心静气的。

当然，动机何在，可能还没有披露出来——不论施佩尔是多么认真地想要找出这些动机来。任何人，尽管有良好的意愿，也未必能够完全避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的批评者看得更好一些。汉斯·弗兰克是施佩尔的同案被告人，他在等待处决期间写下了他的回忆录，正是他写出了人们常常引用的这句话：“再过一千年，德国的这桩罪孽也是不会被忘掉的。”尽管憎恨他自己，弗兰克在他的回忆录中也不免申述他曾怎样尊重法律，并曾怎样努力使这位元首也尊重法律。说他曾这样或那样地从他现在所痛恨的经历中挽救他可能挽救的东西。阿尔伯特·施佩尔可能没有完全免掉人类的这种弱点，但是他不打算掩盖或粉饰任何东西。在纽伦堡审判厅里，他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他可以泰然自若地会见他的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批评者了；尽管他对于自己所犯下的无可挽回的错误还有悔恨之感，可是他确信他已为这些错误付出了他可能付的、也是他的审判官们认为他应该付的代价。

施佩尔自己揭露的事情，其中有些可以作出好坏两方面的判断。施佩尔写道，他头一次见到这位元首，正是在他一生中这样一个时期，那时，他象浮士德一样，愿意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以换取一个肯利用他的建筑本领的主顾。于是便订立了某种类似浮士德契约的契约。施佩尔极力把他的全部精力和才能都交由希特勒随意支配，虽然他竭力避免所有妨碍他专心致志于他的工作的人(包括希特勒在内)。由于希特勒越来越反复无常和难于接近，施佩尔对这位元首的早先的钦佩感逐渐消失了。当希特勒命令炸掉一切时，施佩尔拒绝执行命令，并且准备弄死他，以免这些命令付诸实施。然而，就在希特勒自杀的前几天，施佩尔在俄国飞机和军队的炮火下，搭飞机到柏林的地下避弹室，来和这位元首告别。

关于这次飞往柏林，施佩尔有两种说法。在他刚从施潘道监狱释放出来之后，《明镜》周刊发表了一篇访问记。在这次访问中，他说他到柏林是为了劝说他的一个亲密同伙弗里德里希·吕申离开这个城市。但是，在这本回忆录中，他的说法有些不同。施佩尔写道，他确实想营救吕申出险，也想营救勃兰特博士；勃兰特是他的老朋友，是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这时已落入希姆莱的党卫军之手。在施佩尔柏林之行的后几站，他了解到勃兰特已不在柏林，而且他也不能找到吕申，可是他仍然决定继续走下去。现在他知道，他不得不到柏林去向他非常感激的、并对之怀有极其复杂的感情的那个人告别。

施佩尔在描绘自己时，总是想和他描绘别人时一样地诚实坦率，毫不留情。他曾写道，即使在今天，他也乐意去向那个狼狈不堪的人告别，那个人在他离去时，只是心不在焉地伸出一只软弱无力的手和他一握，并没有说一句关于他们长期共事的话。关于这次柏林之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事情使他改变了想法呢？我认为，

这种改变证明他曾不断重新评价他过去为什么那样做的原因。在他和《明镜》周刊记者会谈时，他所说的很可能是他当时很快地想到的想法；只是在这以后，当他根据这本回忆录的脉络重新检查他现在的感想时，他才清楚地了解到那时为什么要到柏林去，并且即使在今天，他也没有摆脱他在那多事之秋曾为之工作了很多年的这位元首的魅力。施佩尔没有美化了的自我形象需要保护。他的同狱人冯·席拉赫，是和他同时从施潘道监狱释放出来的。席拉赫可能对他认为是自己替德国作的事情进行辩解，但是施佩尔对自己的往事承担完全的责任，并且打算履行他自愿担负的义务，努力弄清他所做的任何事情，不论这样作多么伤害自己的自尊心。因此，我认为，在整个这本回忆录中，在作者所能记忆和了解的范围内，他所讲的事情都是真实可靠的。

关于他在对待犹太人方面的作用，也作了这种十分认真的自我检查。实际上，在迫害犹太人或灭绝种族方面，施佩尔并没有起任何作用。知道这种灭绝种族的事情的人相当少。甚至那些最有关系的人，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以及（很难使人置信地）许多见到毒气室的人，也不肯相信他们所听到的事情。^①这种大规模屠杀实在出乎人们的想象之外，听起来很象是笨拙的宣传。然而，施佩尔能够查清这些事情。他告诉我们说，他的一个朋友，大区长汉克曾访问过奥斯威辛，并于1944年夏季告诫他不要到那里去。但是，这位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的职责并不需要他去关心有关任何死亡制造厂的传闻；他的职责只是和那些能够为他的工厂补充人力的囚犯有关系。因此，他始终没有查问这件事，始终没有去了解汉

① 最近有两种出版物，论述这种令人惊讶的不明真相的情况。一本是雅各布·普雷塞尔写的《德国犹太人的毁灭》，普雷塞尔本人就是集中营的囚犯。另一种是路易·德·戎写的一篇文章，戎是德国军事文件研究所的负责人，文章标题是《荷兰人和奥斯威辛》，载于慕尼黑现代史研究所发行的《季刊》1969年1月号。

克向他指出的这种在幕后进行的骇人听闻的事情。他宁愿不闻不问，转过脸去，集中全力来完成他自己的巨大任务。他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失职，是一种因未做应该做的事而犯下的罪行，它要比他可能犯下的任何罪行更加不可饶恕。

就是由于这一原因，施佩尔并没有象例如德尼茨海军元帅那样，对他的刑期之长表示反抗。德尼茨一直觉得对他的判决是不公正的。他从英美海军军官那里收到了很多封信，这些军官和他有相同的看法，他们主动写信给他，抗议纽伦堡法庭的裁决和他的十年刑期。至于施佩尔，也有许多非德国人，其中包括三名西方狱长，认为他的刑期过长，并建议减刑；但是那些曾经主张绞死施佩尔的俄国人，坚持让他服满刑期。施佩尔并不抱怨俄国人或任何人。他结识了施潘道监狱中的俄国警卫，他们互相交谈子女和家属的情况；谁都不提过去的事情。施佩尔对此感到高兴；他知道，由于他使德国战争机器不断转动，他的看守们一定有些亲友丧失了生命，他们是有理由对他抱有敌意的。但是他们并未抱有敌意；那个前强制劳工也没有敌意，他在监狱中很照顾施佩尔，因为他认为，在他被强制劳动的时候，施佩尔曾让他受到还能过得去的待遇。

施佩尔的悔悟精神，他完全承认在他有权有势时期所作的很多坏事，完全承认很多他自认是不足之处，以及他很透彻的观察力，这就使得本书成为一份很不寻常的文献。它讲了很多有关这段历史是怎样造成的事情，也讲了一些一个被授予一项巨大行政任务的文明人进退两难的心境，因为这项任务最初在他看来是一个有关工艺的、而不是有关人性的问题。施佩尔所讲的很多事情，都和以傲慢自大、荣华富贵的诱惑力，以及创造英雄业绩的机会为内容的旧事有关。在异常愉快地进行青史留名的活动时，许多不愉快的事实都被忽视了；它们只不过是完成宏伟计划时的一些障

碍物。但是，在他为之生活和赖以生活的一切东西全都垮台以后，施佩尔裁判他自己要比纽伦堡法庭裁判得更为严厉。正是在这种长期的、十分痛苦的为了解自己而进行的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在他和阿道夫·希特勒订立契约时丧失了什么东西，他还没有丧失他的灵魂。

尤金·戴维森

1970年5月